

【阅书所得】

古代也有『艺考』

□尚兰凤

又是一年高考季，莘莘学子为了梦想奋力一搏。在古代，科举考试就如同今日的高考，是学子改变命运的重要契机。

古代科举考试的封卷制度始于唐代，完善于宋朝。宋太宗淳化年间，社会风气不佳，教育考试弊病丛生。监丞陈靖负责改革，推行“糊名考校”法，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、籍贯等信息全部糊住，待阅卷结束、成绩公布后再拆封。这一举措有效防止了考试舞弊行为，让科考制度更加科学合理。然而，即便有封卷制度，仍有不法考官通过辨认考生字迹来作弊。于是，宋真宗赵恒在大中祥符八年下令设誊录院，由书吏用朱笔誊抄科考试卷，考官依据誊抄副本评卷。清代科考，乡试和会试采取试卷誊录制度，而童试和殿试试卷，皆为考生亲笔，不用书手另行誊抄，考官直接阅读原卷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古代“高考”——科举中，同样存在“艺术生”的身影。他们凭借在绘画、书法等艺术领域的专长，踏上独特的求仕之路。

早在北宋时期，宋徽宗赵佶便开创了“艺考”先河。1104年，宋徽宗设立画学，也就是如今的美术专业学校，并将绘画纳入科举，以此广纳天下画家。在当时，于“艺考”中崭露头角的书画家，会被录入翰林图画院，且官职配备完善。文学艺术类官员虽能身着红、紫色的高官服饰，却不能佩戴鱼袋(官员用以证明身份之物)，独书画院官员获宋徽宗特许可以佩戴。官员上朝排列位次时，画院官员位列首位，书院官员次之，之后才是琴、棋、玉、百工等官员。据《画继·杂说》中记载：“他局工匠日支钱，谓之食钱。惟两局(图画局和书艺局)则谓之俸直，勘旁支給，不以众工待也。”其他局工匠所领钱财称作食钱，而画院、书院官员所领为俸直，待遇明显更优。

宋徽宗主持的美术考试在京城汴梁举行，他将考试科目分为佛道、人物、山水、鸟兽、花竹、屋木六科，还亲自命题，要求考生依据文人诗句作画，以展现诗句意境，考验其构思的巧妙与脱俗。诸如“野水无人渡，孤舟尽日横”“乱山藏古寺”“踏花归来马蹄香”等题目，都成为检验考生艺术创造力的试金石。

以“嫩绿枝头一点红，动人春色不须多”这一题目为例，多数考生着力在花卉上描绘春色，画面万紫千红，虽栩栩如生，却未得宋徽宗认可。有一位考生则别出心裁，画远处绿荫环绕的楼亭，一位红衣美女凭栏而立，传达出闺中女子被春色所动之情。此画以一点红妆渲染诗句色彩，将色彩与人物情感融合，贴合诗句丰富意蕴，因而被宋徽宗赞为魁

首。另一次，宋徽宗以“竹锁桥边卖酒家”为题，众多考生在画作中描绘酒店，搭配小桥、流水、竹林作为陪衬，却未能表现出“锁”字意境。唯独李唐独具匠心，画一弯清澈流水，一座小桥横跨水上，桥畔岸边的青翠竹林中，斜挑出一幅酒帘，迎风飘动。这幅画虽未直接画出酒家，却巧妙展现了酒家被竹林遮挡的“锁”字之意，被宋徽宗评为此次考试第一名，并录入图画院。

古代科举中，书法也是重要的考察内容，堪称科举考试的“加分项”。史载古代吏部以“身、言、书、判”择人，其中“书”即指书法。在科举中，要想高中，除了具备深厚的经史学识、出色的写作能力，还必须有一定的书法造诣。唐代的柳公权，是唐宪宗元和三年戊子科状元，其书法刚劲有力，自成一派；宋代的宋庠、文天祥，明代的杨慎、吴宽，清代的翁同龢、刘春霖等状元，他们的书法作品同样令人称绝。据史料记载，顺治皇帝喜爱欧阳询书法，顺治九年的邹忠倚、十五年的孙承恩，因用欧阳询字体书写考卷，被顺治皇帝看中选为状元；康熙皇帝则对王羲之书法情有独钟，康熙十八年的归允肃、二十一年的蔡升元、三十九年的汪绎，因模仿王羲之字体答卷，被康熙皇帝赏识成为状元。在康熙三十年殿试中，考官原定吴昺为第一名，戴有祺为第二名，然而康熙皇帝被戴有祺漂亮的书法所打动，朱笔一挥，将戴有祺定为状元，可见书法在科举中的重要性。明朝万历二十六年的状元赵秉忠的试卷，其上的字迹娟秀方正、光洁乌黑、如印刷体般工整严谨，从中可窥古代科举对书法的重视程度。

除了绘画、书法，唐代的制科考试(为选拔“非常之才”而举行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)中，也有选拔特长生情况。国家根据特殊人才需求设置“制科”，若急需军事人才，便设“足安边科”；若需音乐特长人才，就设“才膺管乐科”。不过，制科考试不像常科有固定的考试内容和时间，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与针对性。

古代考生进入考场，也需核实身份，他们的“准考证”叫“浮票”。由于古代科技落后，没有照片，只能用语言描述考生特征。比如“姓名：赖以尊”，以此来确认考生身份。古代考场条件艰苦，明清考场叫贡院，里面没有座位，只有成千上万个狭小的单间，长五尺、宽四尺、高八尺。考生考几天就得在这逼仄的屋子里待几天，吃喝拉撒睡都在其中解决。晚上睡觉只能蜷缩着，个子高些的连腿都伸不开。考生进考场时，接受严格检查，不准夹带，进去后，单间立马关闭上锁，考生在里面答题。



山间耕牧(莫高窟第321窟)

□吴建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当唐代白居易的这首《观刈麦》在耳畔响起，芒种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芒种，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，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，它宛如一位忙碌的使者，带来了收获与播种的双重使命，承载着古人对自然和生活的深刻感悟。

芒种，是收获的欢歌。“芒种看今日，螳螂应节生。彤云高下影，鹄鸟往来声。渌沼莲花放，炎风暑雨情。相逢问蚕麦，幸得称人情。”元稹在《咏廿四气诗·芒种五月节》中，为我们描绘了芒种时节万物蓬勃生长的景象。此时，螳螂破壳而出，预示着生命的繁衍不息；彤云变幻，鹄鸟欢鸣，池塘中莲花绽放，南风裹挟着暑雨。而最让人欣喜的是人们相逢时询问蚕麦的收成，那份对收获的期盼与满足，在质朴的问候中尽显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赵师秀的《约客》虽未直接提及芒种收获，但黄梅时节正是芒种前后，在那绵绵细雨、处处蛙鸣中，似乎能看到田间麦浪翻滚、农人忙碌收割的身影，收获的喜悦在静谧的雨夜中弥漫开来。

芒种，更是播种的希望。“时雨及芒种，四野皆插秧。家家麦饭美，处处菱歌长。”陆游的《时雨》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插秧画面。及时雨在芒种时节落下，广袤的田野里，人们忙着插秧，种下的是对未来的希望。那一顿顿美味的麦饭，是收获的馈赠；一首首悠长的菱歌，是对生活的热爱。“新秧初出水，渺渺翠毯齐。清晨父老携锄，父子争提携。既沐青满握，再栉根无泥。及时趁芒种，散著畦东西。”北宋楼璘的《耕图二十一首·拔秧》则细致地描绘了南方芒种时节前拔秧的场景。新秧初露水面，如翠毯般整齐，清晨父子携手拔秧，那一把把青秧，承载着一家人的希望，在芒种的时节里被播撒在田间。

在古诗词中，芒种时节不仅记录农事的忙碌，还蕴含着诗人对生活的思考。白居易在《观刈麦》中，通过描写芒种时节农民辛勤劳作的场景，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。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”，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艰辛，又以贫妇人“家田输税尽，拾此充饥肠”的悲惨遭遇，与“吏禄三百石，

岁晏有余粮”的官吏形成鲜明对比，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。南北朝长卿的《芒种》“河阴荠麦芒愈长，梅子黄时水涨江。王孙但知闲煮酒，村夫不忘禾豆忙”，同样以王孙公子的悠闲与村夫的忙碌形成反差，道出了农人的辛劳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阶层在芒种时节的不同生活状态。

芒种诗词中还蕴含着中国人独特的时间哲学。与西方线性时间观不同，中国传统的时间感知是循环往复的，如同芒种年复一年的到来。苏轼在《浣溪沙·芒种》中写道：“软草平莎过雨新，轻沙走马路无尘。何时收拾耦耕身？”词人由眼前芒种景象联想到自身归隐农耕的愿望，展现了个体生命与自然节律的共鸣。这种将个人命运嵌入节气循环的思维方式，体现了中国人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观。而宋代诗人陆游则在《芒种后经旬无日不雨偶得长句》中写道：“芒种初过雨及时，纱厨睡起角巾欹。痴云不散常遮塔，野水无声自入池。”诗人以平静的心态接受阴雨连绵的芒种天气，在时间的流逝中寻找内心的安宁。这种对时间的诗意把握，使中国节气文化具备了超越单纯历法意义的哲学深度。

芒种时节，气候也在古诗词中留下独特印记。“乙酉甲申雷雨惊，乘除却贺芒种晴。插秧先插蚤粳稻，少忍数旬蒸米成。”范成大的《梅雨五绝》写出了芒种时节风云变幻，时而雷雨交加，人们盼望晴天以便农事的心情。在新疆伊犁，芒种又是另一番景象，洪亮吉的《伊犁记事诗》云：“芒种才过雪不霁，伊犁河外草初肥。生驹步步行难稳，恐有蛇从鼻观飞。”即使芒种已至，伊犁依然有雪，河边草肥，初生的小马小心翼翼，一幅独特的边塞风光跃然纸上。

芒种，这个位于农历五月中旬的节气，是夏收与夏种交织的农事繁忙时节，也是中国古典诗人笔下充满生命张力的时刻。诗词中的芒种，是自然的礼赞，是生活的诗篇，是劳动的颂歌。它让我们穿越千年时光，感受到古人在芒种时节的忙碌与喜悦、汗水与希望。当我们穿越这些古诗词的时光长廊，会发现芒种不仅是一个气象节点，更是一种文化密码，承载着中华民族对时间的独特感知、对自然的敬畏崇拜以及对生命循环的哲学思考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